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
元
明
清

巴蜀書社

译注 朱邦蔚 关道雄
审阅 周勋初

龚自珍诗文选译

龚自珍诗文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
选译丛书

己酉年
书

3566

622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龚自珍诗文选译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周锡光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龚自珍诗文选译

朱邦蔚 关道雄译注

巴蜀书社 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100千

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SBN7-80523-637-2/Z·79

定 价：140.00元（第三批35种）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言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夜，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外国资本主义扩张势力不断侵入，老迈的大清帝国被逼到了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沉重的危机意识，促使有着国家、民族使命感的中国知识阶层诞生了第一代呼唤“变法”、“更图”的近代改良派和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又字璚人，一名易简，字伯定；又名巩祚，号定盦。晚年又号羽琤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十九岁以前，主要在家中学习经学、文学。

龚自珍出身于一个典型的世代官宦学者的家庭。他的过继祖父龚敬身、祖父龚提身、父亲龚丽正，都是由科举入仕，在朝廷或地方上为官，而且都有文集或学术著作。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善写诗，亦有诗集传世。龚自珍童年即在母亲的指点下诵习诗文；十二岁，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解字》；十六岁，读《四库提要》。在家庭良好的学习气氛熏陶下，龚自珍很早就对科名掌故、古今官制、目录学、金石学发生了兴趣，并尝试作了一些考据和研究。在文学上，少年龚自珍也显示出令人可喜的创作才华。十三岁，他应塾师之命，作《水仙花赋》；十五岁，诗集编年；十九岁开始倚声填词。“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龚自珍《己亥杂诗》。以下凡作者诗文，不再署名）从龚自珍的自我表白里，我们可以推知这些早年之作的特色。

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是龚自珍思想的发展期。

嘉庆十五年（1810），十九岁的龚自珍第一次参加乡试，中副榜第二十八名。二十一岁，充任武英殿校录，开始研究校勘掌故之学。同年，与外祖父段玉裁的孙女段美贞结婚。然而时仅一年，妻子就不幸病逝。在此前后，龚自珍曾两度参加乡试，

均告落第。直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二十七岁始中举。这一段经历，使他逐步加深对社会、人生真实面的认识，并从自己的科场失意中体验到政治的黑暗与制度的腐败，由“伤时感事”（《别辛丈人文》）而产生了改革时弊的要求，先后写出《明良论》（四篇）、《乙丙之际著议》（十一篇）、《尊隐》、《平均篇》等重要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1817），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就教于文坛耆宿王芑孙。王阅后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很担心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引来不幸，劝他“修身慎言，远罪寡过”^①。总的说，这一时期龚自珍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接受乾嘉学派影响。他的外祖父、文字学大师段玉裁对他尤其寄予厚望。龚自珍二十一岁时编集《怀人馆词》三卷、《红禅词》（即《无著词》）二卷，段亲自为之作序，称赞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沉逸，居可知矣！”^②一年以后，年已七十九岁的老人又再度写信勉励他“博闻强记，多

^①见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②段玉裁《经韵楼集·怀人馆词序》。

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①段玉裁去世前一年，读到龚自珍的《明良论》，更是欣赏，说：“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毫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②龚自珍对外祖父的教诲一直非常感激，曾作诗称：“斯文吾述段金沙”（《己亥杂诗》）。他还在诗末特别说明，自己“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正是从跟外祖父学习《说文》开始的。不过，从龚自珍写于本时期的文章来看，他对时事政治的深切关注以及强烈的改革意识，已经不是家学和时代学风所能囿限了。

从二十八岁到五十岁去世，是龚自珍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他思想的成熟期。

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十八岁的龚自珍从著名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学。今文学派治经精神是轻古经而重时政，主张从《春秋》找微言大义，以抒发对当代政治现实的看法。这一点引起了龚自珍的浓厚兴趣。这一段的学习，无疑大大推进了他学术思想的成熟，从此他自觉地以今文经学思想，通过谈经论史指摘时弊，宣传变革，

^①段玉裁《经韵楼集·与外孙龚自珍札》。^②见《明良论四》文末作者自记。

开创了近代“经世致用”之学。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以举人任内阁中书职。道光九年（1829），龚自珍第六次参加会试，始中进士。殿试对策，他从政教、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其精神大致效法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见《己亥杂诗》第44首自注），具有鲜明的改革色彩，引起震动。随后的朝考，撰《御试安边绥远疏》，以刚刚平息不久的新疆张格尔叛乱为例，直言不讳地提出“以边安边”、“足食足兵”的主张，令阅卷诸公大惊，终于借口“楷法不中程”，不列为优等^①。因此，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龚自珍才由内阁中书迁宗人府主事；两年后补主客司主事，但仍旧是冷署闲曹之职。本时期，龚自珍继续撰写许多著名文章，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古史钩沉论》等等，从不同方面表明他对现实政治日益深刻的认识。道光十九年（1839），四十八岁的龚自珍深感自己因力主革新而“动触时忌”，终于以父亲年老等借口，辞官南归。在归途中，他写出著名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以及著名

^①见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

散文《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

五十岁时（道光二十一年，1841），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时为鸦片战争的第二年。

、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龚自珍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看出时将大变的必然。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指龚自珍、魏源）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①龚自珍不止一次地指出，封建国家已经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尊隐》）。而昏庸、腐败到麻木无知的统治者们还在作着太平美梦——“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不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龚自珍敏感地觉察到这种病态心理的可怕，从而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改革意识，龚自珍对封建社会的各方面作了广泛的批判，同时积极地提出不少“更法”的主张。在《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章中，他深刻地揭露了朝廷官吏的因循守旧与无能、自私，从而暴露出整个统治机器的运转失灵。龚自珍认为，国家的衰败最严重的莫过于人材匮乏。大批无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德无能之人久居高位，以及当时选官任人论资排辈的做法，严重地压抑了人材的成长。他的《上大学士书》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要求改革内阁制度。道光十二年，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见《己亥杂诗》第77首及自注）。他还力主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以收真才”（《拟釐正五事》）。晚年所作的《病梅馆记》，更曲折地表达了对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显示对封建制度扼杀人才、摧残人性的抗争。

龚自珍对民生疾苦也多有揭露。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就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西域置行省议》）其它如《己亥杂诗》“五都黍尺无人校，抢攘廛间一饱难”，反映民生凋敝；“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反映赋税繁重，都能切中时弊。龚自珍还把注意力集中到封建社会里带根本性的土地问题上。在《平均篇》里，他指出土地兼并、贫富不均将会导致“丧天下”的危险局面，认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提出“均田”的改革方案。在后来的《农宗篇》，他又提出按宗法分田，主张“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土地占有制。尽管这些设想未必尽

善，但他能从土地问题看到造成社会动乱的基本原因，并对贫苦农民深致同情，这的确难能可贵。

对当时外国殖民主义的入侵，龚自珍表现了鲜明的爱国精神。他的《西域置行省议》的出发点之一，就是针对沙俄的侵略。对当时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野心，龚自珍更是早有觉察。道光三年的《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里，他明确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提醒国人警惕。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南下禁烟，龚自珍又以《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力主严禁鸦片，武装抵抗英国侵略者，同时驳斥投降派的种种谬论。

龚自珍的治学态度严谨而注重实际。这也得益于早年家学的薰染和后来对今文经学的探求。他撰写的《尊史》一文，进一步阐发前辈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强调史官的重要，并以当代史官即历史家自任，实际上就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他还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他曾以饱满的热情研究“天地东西南北之学”^①即地理学，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

①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

度和边疆民族地理，这些同样显示了他“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

不过，作为时代的先觉者，龚自珍的苦闷也是巨大的。他因思想敏锐、言论激烈，常常被守旧派视为“怪物”。而朋友亦常有不理解他的地方。他的好友，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的进步思想家魏源，就曾写信劝诫他：“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地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失。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爱，不啻手足，故率尔诤之。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① 纵观龚自珍一生，科场仕途的坎坷，社会上层的排斥，周围人的不理解，所有这些，使他在不断抗争中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寂寞之感。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心境的记录：

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

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陨少微星。

平生不蓄湘累问，唤出姮娥诗与听。

——《夜坐》

①《魏源集》第92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